

## 目 录

- 一曲胜利的战歌……………陈庆伟(1)
- 高州中学九名学生赴延安参加抗日经过……………石 荃(7)
- 解决经济供给 发展革命力量……………琦 树(10)
- 李雅可二三事……………石 荃(15)
- 高州植胶三十年……………朱诚中(19)
- 高州工业在前进……………邓祖德(24)
- 高州角雕……………何 培(36)
- 高州胡椒……………吴严华(39)
- 高州最高学府——广东高州中学(续)……………钟竞达 熊 葵(44)
- 画家、金石家、庭园设计家梁白云……………苏瑞长(47)
- 高城几项近代经济文教事业的嚆矢……………梁基毅(49)
- 清末民初高州地区的农民斗争……………陈 兴(51)
- 高州宝光塔……………张均绍(56)
- 观山古寺回文诗……………何 培(58)
- 刻苦自学晚年登科的李少朴进士……………黄钟俊(59)
- 高州县出土文物概况(续)……………刘明宽(62)
- 丹东也有洗太庙……………黄国宝(65)
- 高州天灾纪略……………黎庆文(66)
- 清末民初高州府、茂名县官职简表……………梁基毅(80)
- 高州新八景——四(国画)……………张宗俊(封二、三、封底)
- 封面设计……………张宗俊

# 一曲胜利的战歌

——记茂名师范一九四六年的反饥饿斗争

陈庆伟 调查整理

茂名师范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，那时，按国民党政府规定，每月发给每个学生生活津贴谷四斗。一九四六年四月间，茂名县反动当局无理扣发学生津贴和教师薪水，因而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公愤，他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的群众斗争，赢得了胜利，为我县学运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。

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家境清寒的，不少人有要求革命的积极性。因此，我县地下党一直把它作为重点活动基地之一。打四十年代开始，即我县党组织恢复重建不久，在学生中先后派进或发展的地下党员就有罗淑英、龙思云、吴良材、杨进瑞、王学明、李俊瑜、梁凌霄、钟乃绩、李颐年、郑光民、钟正书，等等。此外，还有地下党员袁里光、李茂源、梁钜汉、李明华（他是我县地下党领导人之一）、车振伦（他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共青团南路特委书记，南路党组织恢复重建后他已同党取得了联系）等也先后进入学校，分别以做杂工、庶务、教师、会计为掩护，开展地下工作。他们以共产党员的先锋和模范作用去影响和带动广大师生，把广大师生团结在党的周围。一九四一年，袁里光、李茂源两位同志，按照党的指示，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。一九四三年，这所学校的各个班级都组织了读书会，秘密传阅革命书刊，定期组织专题讨论，以

马列主义武装群众。从一九四四年起，在参加读书会的人员中进行严格的挑选，发展了一批革命游击小组成员。他们的大多数接受组织的派遣，分头到我县农村去，参加了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举行的武装起义，受到了锻炼和考验。这次武装起义受挫后，党组织安排政治面目尚未暴露的游击小组成员许俊文、柯乙福、吴时苑、冯柱朝、李匡一等继续回校读书，进行革命活动，后来他们便成为这场反饥饿斗争的骨干力量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。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，多么渴望医治战争创伤，进行和平建国啊！可是，独夫民贼蒋介石却违背人民的心愿，倒行逆施，无耻撕毁了国共两党达成的《双十协定》和政协决议，不断调遣大批军队向华北、东北解放区进犯，频频挑起内战，继续把中国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。谴责之声遍及全国，人民群众怒不可遏，纷纷起来反对。继昆明学生联合罢课之后，北平、广州等地的学校师生也相继响应，革命浪潮不断高涨。此时，我县反动当局慑于群众的革命声势，表面上也讲些和平、民主，不敢太露骨地用野蛮的手段来压迫人民，而实际上则恨不得把革命火焰扑灭。不管反动派耍什么花招，在全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下，高州城学生正在酝酿着一场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，高州城地下党负责人林其材同志审时度势，了解到茂师的广大师生对伪县府扣发津贴和薪饷而极端不满，即同茂师党支部许俊文、柯乙福、吴时苑和游击小组冯柱朝、李匡一等同志商量研究，决定抓住这个题目来做文章，因势利导，发动一场群众性的斗争，以配合全国革命形势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，教育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。

决定作出后,共产党员和革命游击小组成员分头串连,发动学校师生,大造革命舆论:“既然政府说没有钱粮给我们发放津贴、薪饷,为什么又有钱粮拿去打内战呢?”“政府不给我们发放津贴、薪饷,是不是贪官污吏从中作弊了?”以此启发引导师生们来跟国民党反动当局打一场政治仗。思想进步的教师朱耀文、卢叔度、陆士风、刘美侃、佟显仁等,也对伪县府扣发津贴和薪饷极为不满。朱耀文、卢叔度在课堂上大讲《硕鼠》、《离骚》等故事,以古讽今,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。刘美侃积极画漫画,帮助学生出壁报,搞宣传。有的学生形象地把一个瓦煲挂上学校的旗杆顶上去,名曰“吊煲”,即断炊的意思。这样搞得茂师校园群情鼎沸,大大激发了师生们的革命热情。

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,不是没有阻力和斗争的。平时行为鬼祟、言论反动的训育主任梁儒宝和学生杜××、梁××、龙×等几个小丑,跳将出来,煽阴风,泼冷水,恐吓大家不要闹事,要大家安分守己取毕业文凭。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,统一认识,鼓舞斗志,进一步发动群众,茂师地下党支部通过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,召集全校学生(教师列席)开了一个大会,让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在会上发表意见。经过激烈的辩论,使到会者受到一次政治思想教育,师生中进步的、中间的、落后的、反动的阵线分明,大多数人赞成支持我们的意见,决定先组织一部分学生到县参议会去请愿,要求立即补发学生津贴和教师薪饷。

四月下旬的一天,请愿队斗志昂扬地到县参议会去。县参议长江友松接见了他们。请愿队即对江友松提出了迅速补发津贴和薪饷的要求。开始,江友松诸多解释,没有明朗表态。但请愿队坚持同他进行说理斗争,最后迫使他答应向县政府转达请愿队提出的要求。

请愿队回校后，全校学生集中在校门前球场，冯柱朝即向同学们汇报请愿情况，说明参议长没有诚意，我们斗争的目的尚未达到，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，群情激愤，当即通过决定：举行全校罢课，组织游行示威，直接向县政府请愿，坚持到胜利为止。为了赢得胜利，党员和游击小组成员依靠进步师生，一面在校内继续深入发动，教育团结争取多数，孤立少数，一面派人前往高州中学、高州女师、高州农校、茂名中学等兄弟学校进行串连，以壮大力量。

游行示威的组织工作就绪后，五月上旬的一天，茂师四百多个学生在校园集合起来，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这雄壮的歌声，震惊了该校训育主任梁儒宝，他妄图阻止学生游行示威，探头探脑地走出来干预：“你们不能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呵！如果再唱就要受到政府制裁的。”同学们不理睬他的恫吓，据理驳斥他：“抗日爱国歌曲为什么不能再唱了？难道你要我们驯服地做奴隶吗？办不到的！”同学们不管他那一套，继续大唱特唱，越唱越响亮。队伍从茂师校园出发，经城东门口，直入中山路，沿途振臂高呼：“坚决反对贪官污吏！”“要立即补发学生津贴和教师薪饷！”等口号，并散发宣传品，群情激昂，阵容威武。高州中学、高州农校的师生在各自的校门口给茂师游行示威队伍鼓掌助威，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参加到游行示威队伍中来，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。街道两旁很多工人、商人和居民也热烈鼓掌表示同情和支持。当队伍到达伪县府时，那里已森严壁垒，军警林立，个个荷枪实弹，并架起几挺机枪，阻拦着游行示威队伍的进入。经过一番舌战之后，他们被逼答应派出代表入内面见县长。以冯柱朝、朱耀荣为代表，直闯官府衙门，向伪专员林时清和伪县长陈子和递交了请愿书（请愿书的主要内容是，要立即补发学生津贴和教师薪饷。今后要保证如期发给。要切实保障学

生有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、演剧等自由。限期答复和实现请愿书所提的要求，等等），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。他们被迫答应了请愿书的要求，但他们很狡猾，却给茂师师生交了一张空头的提粮单，欺骗师生们到石骨、石鼓两地粮仓空走了一场。这使大家更气愤了，一场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。

茂师师生的正义斗争，得到高州中学、高州女师、高州农校、茂名中学等校师生的同情和支援，有的刊出壁报抨击反动当局，有的张贴标语表示声援，鼓励他们斗争到底。

五月中旬的一天，茂师再次组织一百多个学生上街游行示威，直闯伪县府找县长陈子和质问、辩理。陈子和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，躲在他的别墅（今粮食加工厂的所在地）蜷缩着。愤怒的学生获悉后，又随即追踪到那里去。起初，他躲而不出，但几经交涉，他不得不答应接见了十二位学生代表进行谈判。他花言巧语，说什么“政府粮仓没有存粮了，希望大家体谅政府的困难”。学生代表们不买他的账，坚决要求速发津贴和薪饷。他见到学生代表的态度很强硬，又听到门外请愿队伍的呼吼声，最后他颤抖地许诺尽量想办法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
第三次行动后，由于斗争目的仍未达到，茂师师生继续罢课，其他学校也在酝酿配合茂师的斗争，反动当局看到情况对其不利，于是伪县长陈子和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，百般提防地来到了茂师礼堂召集学生“训话”。开头，他猛抛“浪头”，想唬吓大家不要再闹事。学生哗然，顿时会场秩序散乱。他老羞成怒，大声喊叫：“谁有意见就上台来讲！”他以为这可把大家镇住了，万没想到却把大家气了起来。冯柱朝、李匡一等带头蜂拥而上，面对这位“县老爷”质问、说理，搞得他目瞪口呆，支吾其词。虽然他感到理亏词

穷，威风扫地，但又想挽回一点面子，继续“训话”说：“你们学生要以读书为重，不要乱想异动，防止为不轨分子所利用”。话音刚落，大家又当即要他解释“什么是乱想异动？”要他指出“谁是不轨分子？”他满头大汗，狼狈不堪，无话以答，最后灰溜溜地走了。

这一次斗争很有效力。他回去后几天，津贴、薪饷都如数补发了下来。此时，林其材同志即跟茂师党支部和滏分游击小组成员分析研究，认为这场斗争已达到预定的目的，应该适可而止，不要再去做超越客观条件的事情。如果搞到自己暴露组织或遭受挫折，那就反为不美，招来损失。于是决定通知大家复课，宣布这场斗争告一段落。这场斗争约经过一个月。

茂师这场反饥饿的斗争，是有着一定经济成效和重大政治意义的。其一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益，全校师生如数领到了薪饷和津贴，并进一步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腐败，打击了贪官污吏；其二，教育和团结了广大师生，孤立了以反动训育主任梁儒宝为首的极少数坏人，发展了进步力量；其三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。通过这场斗争的考验，冯柱朝、李匡一、邓培基等先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，壮大了党的组织。

这场斗争能够赢得胜利，总结其经验主要有三条：第一，有党的直接领导，及时分析斗争形势，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，做到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，既打击了敌人，又保护了自己；第二，注重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抓住广大师生的迫切要求，广泛发动群众，把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与我党有计划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，使它成为群众性的运动；第三，不是孤军作战，而是四方配合，积极争取了进步教师和兄弟学校的支援，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战斗力量，取得了辉煌的战果。

# 高州中学九名学生 赴延安参加抗日经过

石 荏 调查整理

一九三八年秋，高州中学九名学生秘密地从高州赴延安参加抗日运动。他们是：师范班的廖盖隆、杨优德、杨林熙、卓树基、程均昌、杨进琳、刘淑祥（女），普通班的余荣中、李淑珠（女）。九人中，李淑珠是初中班的，其余都是高中班的。他们都是当时高州中学抗日救亡宣传队的主要成员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的“芦沟桥事变”。事变发生后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《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》，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，筑成民族统一战线之坚固长城，抵抗日本的侵略。但是，反共媚外的蒋介石政府，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，使大片国土沦陷于侵略者的铁蹄下。对内，蒋介石则竭力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制，推行所谓“新生活”运动，鼓吹青年读经，宣扬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，企图把青年引入歧途。蒋在庐山举办中学校长训练班，集训中学校长。当时高州中学校长余兆田从庐山集训回来后，就把一批秀才请进学校，教学生读经，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。对蒋这种倒行逆施，广大青年学生十分不满。当时，高州城里各中学都有师生自动组织起来的抗日救亡宣传队，高州中学抗日救亡宣传队就是这些宣传队中的一

支。他们经常利用星期日、假日，到街上和附近的墟镇，如茂南公馆等地去宣传，演街头剧，散发救亡小册子等，宣传群众，发动群众抗日救亡。廖盖隆等是宣传队的骨干。平日，他们在学校里常背着校方阅读进步书报。廖盖隆住的房里，放着很多上海、广州出版的书籍刊物，如《大众哲学》、《唯物辩证法入门》等。通过阅读这些书刊，接触了革命思想。

一九三八年秋，他们即将毕业。当时，国家的危亡，民族的兴衰，个人的出路，都一齐摆在他们面前。是置国家民族于不顾，只求个人出路，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，投身抗日运动呢？按照当时的情况，继续升学或者在社会上找一个职业，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的。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抗日救国的道路。他们志同道合，决定到延安去上抗大，把自己的力量献给民族解放的事业。可是，高州与延安相隔几千里，这中间山长水阔，人生路不熟，怎么去呢？正当他们分头寻找关系的时候，李淑珠的一个同班同学梁锡珍告诉李淑珠，她的哥哥刚从延安回来，去延安的事可以查问他。李淑珠把这消息告诉廖盖隆。廖等得悉后，都很高兴，他们立即推出廖盖隆、余荣中、卓树基、李淑珠去见从延安回来的人——梁锡珍的哥哥。通过梁锡珍，他们在南关梁锡珍家里见到她的哥哥梁锡琼。他们向梁锡琼诉说了自己的计划，表明了决心，请他介绍前去。梁说，延安的生活很艰苦，你们经得起吗？他们表示无论多苦，都要去，梁锡琼又对他们说：这事要保守秘密，不要告诉别人，于是梁便介绍他们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去。

找到去延安的关系后，他们决定暑期动身。九人之中，廖盖隆、余荣中、杨优德是信宜人，其余都是茂名县（现高州县）人。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七日，茂名的同学从高州城出发，到余荣中家集

中。在余荣中家里，有一个当地知识青年杨立展，他知道他们要去延安，也要求跟随去。大家同意了。于是九人变成了十人。但是杨进琳未能依约到达。直到第二天，他们登上白鸡岭休息时，杨进琳才托着一个皮箱匆匆赶了上来。

他们从信宜经南江口到达广州。到广州后，在百子路找到八路军办事处。办事处的同志接见了他们，对他们进行了口试和笔试，填写了报名表。广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他们开了介绍信，要他们到武汉再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。他们拿到介绍信后，从广州乘火车到武汉，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了介绍信，又乘车到郑州。到达郑州时，广州形势紧张。在郑州火车站他们受到军警的盘问。为怕发生意外，他们不敢在郑州停留，因而没有去郑州八路军办事处转介绍信，便立即乘火车去西安。到达西安时，这里形势更紧张。车站上军警很多，逐个搜查旅客的行李。他们在广州、武汉买的一些进步书报杂志全被没收。幸好没有搜身，藏在身上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没有被搜出。他们当晚雇了几匹驴子，便离开西安，向关中出发。几天后，他们安全地抵达边区。那一天，他们正在树下歇息，忽然听到“得得得”的蹄声，后面有人来了。原来是慕君骑着一匹毛驴来了。慕君也是高州中学的学生，但与他们不同队。想不到他们会在这里相遇，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一起来了。

七月底，他们到达关中的旬邑县看花宫，进入了陕北公学的分校。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，分校校长是罗迈。他们在陕北公学分校初级班学习了两个月，接着升入高级班。在高级班学习了三个月后，胡宗南进攻边区，分校迁回延安。他们便随校到延安。到延安后，他们便分散了。其中廖盖隆、卓树基被分到马列主义学院学习，程均昌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，余荣中到晋东南工作。（下转第14页）

# 解决经济供给 发展革命力量

——记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县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发展以及解决供给的情况

琦 树 调查整理

## 一、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发展

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县的党组织不但更加巩固、发展，武装力量也迅速壮大起来。

一九四七年七月，为适应形势发展，改茂电信特派员制为中心县委制，成立茂名中心县委，领导茂名、电白、信宜三县工作，书记王国强，委员为车振伦、郑光民、钟正书。

一九四八年五月，茂名中心县委撤销，成立茂电信地工委，书记王国强，副书记林其材，委员为车振伦、郑光民、钟正书，四九年增加陈兆荣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我县成立茂西北区工委和茂东南区工委。茂西北区工委书记杨麟，副书记周文莲；茂东南区工委书记柯越馥，副书记柯日伦。

一九四九年二月，茂名县委正式成立。书记龙思云，委员为陈以大、杨麟、梁振初。七月，增加梁昌东为副书记，谢华胜为委员。全县分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区建立四个区委，基层组织进一步得到发展。

这期间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迅速发展壮大。一九四六年五月，茂南飞马地区组织一支“茂电信武工队”，队长郑奎，副队长梁振初，指导员钟正书，队员二十多人。八月，建立“茂电信独立大队”，大队长梁振初，政委钟正书，共一百四十多人，分三个中队，活动于茂名、梅录、电白、阳春一带。一九四七年二、三月间，独立大队改称“南路人民解放军新四团第六连”，开赴化州、廉江作战。六月，六连被编入南路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警卫连，后编入东征团，于一九四八年东征粤中，成为粤中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。

一九四七、四八年间，在上级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下，茂东的云潭、泗水、分界，茂南的飞马、陈垌、里麻，茂西的沙田、镇江，茂北的“台湾区”（深镇、古丁），“青岛区”（大潮、东岸），“广州区”（平山、长坡）等地都建立了武工队。

一九四八年冬，地工委授命茂名县组建一支县游击大队，把任务交给茂北区工委。一九四九年春，游击大队正式成立，命名为“大钊队”，政委杨麟，大队长刘绍兰。辖一个中队，六十多人。一九四九年秋，大钊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第五支队十五团，属“大钊连”。

一九四九年春，茂名开始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第五支队第十四团。十月，十四团正式成立，团长先后为黎光烈、刘绍兰，政委先后为杨飞、杨麟，政治处主任为杨超。

## 二、筹粮组织和筹粮情况

因我县红色政权建立较晚，各游击区亦不够巩固，所以未设立过财税机构及财税人员。正规武装队伍建立前，革命工作者的供给，均在各游击区内自筹解决。筹粮筹款时，人人动手。一九四九

年春，“大钊大队”建立后，设过专门的筹粮人员，筹粮队长为李文新。粤桂边纵第五支队成立后，五支十四团活动于高州，团设后勤供给处，供给处主任先为陈擎天，后为张杞才。供给处下设粮秣股，负责筹粮筹款，保障部队供给。由于我县在财税方面的史料较为缺乏，筹粮筹款总数亦无法统计。这里反映的只是当时解决我工作人员和部队供给的一些情况。

根据我县革命发展情况，解决革命工作者和部队的供给问题，主要有下列几种方法。

1、向地主富农要粮。地主富农占有大量粮食，族中公尝也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向地主富农要粮，是解决战斗部队供给的一种重要手段。“大钊大队”建立后，“青岛区”（今大潮公社）把地主富农的情况进行排队，指定他们向我们交粮。例如：一九四九年向良德地主周德轩要粮，缴来白银三十多元；大潮地主余公望缴来白银三十多元；三杏村地主黄立标缴粮十二石；洗某缴粮六石；周善星婆缴粮五石。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五、六月间，“青岛区”用这种方法向地主富农要到粮食三、四万斤，白银一千多元。一九四九年六月，上茂西游击区建立，亦指定要地主富农交粮交枪，筹到大批粮食和枪枝。其中贺花乡十指田地主伍福珍缴粮二十石。

2、没收。有两种情况：一是打反动地主，没收他们的财产，二是“爆仓”，夺取国民党仓库存粮，供给部队。例如：“大钊大队”北上信宜，攻打国民党砂子粮仓，夺得大批粮食，同时，没收了两户反动地主的财产。一九四九年七月，茂北区武工队截获敌东岸粮仓粮食一百多石。一九四九年九月，茂南武工队奇袭陈垌粮仓，切断敌俞英奇部队的粮食供给，夺得粮食五万多斤。这批粮食，大部份分给了群众。

3、征。向地主开办的石灰窑、糖寮以及霸占的草坡等征税，例如：一九四九年七月，茂东根子武工队向地主的灰窑征税，共征得白银一千三百多元。茂南向地主的糖寮和草坡征税，也征得税款若干。

4、向工商户和一些富裕的农民借粮借款。例如：周文莲向黄塘墟一商人借到白银三百元。茂北向古冢村陆儒瑞借粮十石，向陆立借粮五石。大潮向胡三奶借得白银六十元。

5、发动群众捐助。做法有二：

(1) 在游击区里，发动基本群众捐粮捐款，例如：一九四九年，“青岛区”砵石村周树彪三奶捐白银一百元，全村群众也纷纷捐献，共得白银一百八十元，粮八十石。

(2) 通过统战人士募款。我县很多知识分子倾向革命，支持革命，我们便通过他们向社会募款。例如：一九四九年，我县文教界的统战组织“文新革”在党的领导下成立，梁昌东同志指示他们筹款，“文新革”成员伍圣瑞、莫仑、崔冠璞、曾邦迈、梁莲芳、林植枢等，先后筹得白银二千元左右，港币两万元，还有金块、金饰和盘尼西林等贵重药材一批。

6、自带。正规部队建立前，自带是我们解决工作人员供给的基本方法。自带粮款闹革命，这是很普遍的。具体有下面几种。

(1) 把自己家里的钱、粮、款拿出来。当时革命队伍中流传着两句话：带上自己的钱，背上自己的枪。例如：大应岭欧三奶家是我党地下交通站，她家境贫困，为了解决同志们的吃饭问题，她上山斩柴筹款买米供给同志，最后全家为革命献出生命。白土村朱至唐同志家，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，成为我县的交通总站，党的一些领导同志经常住在他家，这些同志和过往人员的食宿，都是由他家供给。

(2) 请谷会。家中无钱粮可带，通过“请谷会”的办法筹集粮食。

(3) 向亲戚朋友借。例如：茂北张立勤，为了解决同志们生病吃药问题，通过亲戚生谷十几担，开了一间药铺，为革命服务。

(4) 变卖产业。例如：一九四七年，周文莲卖掉二十担祖尝田，得白银三百元，全部交给组织。熊宜武烈士，为给东征部队筹款，变卖十担租田产，得关金券二千元，全部上交。陈泽永和梁琳同志，把自己的二十担租田和嫁妆卖掉，交给组织。郑光民同志的爱人李乃珠，把自己一笔很大的嫁妆卖掉，交给组织。茂南合水不少姑娘，参加革命时，都把自己的嫁妆卖掉，把得到的钱交给组织。大潮胡瑞有，为了解决同志们的吃饭，把仅有的一条耕牛卖掉，自己全家则吃番薯汤。

(5) 节衣缩食，为革命多筹粮款。一些在社会上有公开职业的党团员，把收入所得除自己的基本伙食费外，全部上交组织。例如：在茂南白土瓦屋岭小学任教的党团员冯柱朝、许俊文、李匡一、朱耀荣等，都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上交。

---

(上接第9页) 从此，他们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学习、工作。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，连杨立展在内的十位同志，有三个为党为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他们是：余荣中、程均昌、杨立展。刘淑祥也在“文革”中去世。现在还健在的有廖盖隆，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；杨进琳，现在核工业部原子工业设计院工作；杨优德，现在北京进出口公司工作；杨林熙（现名杨毅），现任广州市委顾问（原广州市委副书记、副市长）；卓树基，原湛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已离休；李淑珠，现任武汉市委党校副校长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，他们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# 李雅可二三事

石 荏 调查整理

李雅可，沙田玉堂乡山曜村人。青年时期求学于广东陆军学校，毕业后任茂名征兵营教官。因不满征兵营的黑暗，愤而辞职回乡。

李雅可文能武，敢作敢为，有勇有谋。在乡间，他常为群众出头说话，抱打不平；因此，群众很敬佩他，但是土豪劣绅却怕他恨他，却又不敢把他怎样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叛变了革命，挥起屠刀，把人民投进了血泊之中。南路的反动派，紧跟着蒋介石，成立了“高雷清党委员会”，强行解散工会、农会，屠杀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。在农村，地主豪绅也神气起来，他们乘机变本加厉地压迫剥削农民。李雅可看见土豪劣绅倒行逆施，十分气愤，决心要治一治这一帮家伙。一天，他悄悄地离开了家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时间一晃就是十多天。

一天，正是沙田墟墟日。中午时分，墟上挤满了人，就象蜂群闹午，熙熙攘攘。忽然，墟头上抬进一顶轿子，轿夫大声吆喝人们让道。从轿窗看进去，一个头戴白通帽的人端端正正坐在里面，这人正是李雅可。轿子穿街而过，招来了满墟的议论。人们猜测：李雅可从哪里回来的？做了官么，这么气派？人们凭着想象添枝插叶，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传遍了全乡。

雅可回到家里，第二天就忙开了。他戴着雪白的通帽，手持乌油油的“土的”棍，穿村过户，去拜访乡长、保长们。那些乡长保长早已听了传闻，心里正疑惑着，不知究竟，都想打听个明白。可是苍蝇抱鸡蛋——无缝可钻。因李雅可平日在乡里是很少与他们来往的。现在李雅可忽然登门拜访，个个不禁受宠若惊。但又心里挂着个闷葫芦，不知李雅可此来何为，很是惶惑。他们都忙着给李雅可端茶送烟。雅可也不谦让，慢条斯里地坐下，说：“兄弟这次到省城跑了一趟……”，乡长、保长一听果有来头，忙装着笑脸，洗耳恭听。雅可见状，乘机渲染了一番省城的气象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说：“这次赴省，主要是向上反映民情，询问政府工作方针，请上头训示。我在省府拜会了许多政府大员，有的是我读陆军学校时的老师，有的是我的同学。他们都很关心地方民情，对县里工作作了很多训示。”那些乡、保长们虽在乡间横行霸道作威作福，但他们谁也没有进过省城，都是些土头土脑的“大头虾”。他们原来对雅可已畏惧三分，现在听雅可说得头头是道，都以为雅可真的从省里带着大员的训示回来，就更害怕了。雅可乘机如此这般地训斥起来，他说：“省府要求，地方各级政府及乡绅，均应遵守党义，遵循孙总理遗训，体恤民众，俯察民情，不得擅作妄为，弄得百姓不能安生。残害民众，天怒人怨，结果会自陷过错自食恶果。执行训示，民众反映良好者，下次上省，本人自当替你们报告。”雅可一番说话，连训带吓，把那些家伙训得头低低，耳昏昏，做声不得。

其实，李雅可根本就没上省城，连县城也没去过，只是跑到亲戚家里住了十多天不露面而已。李雅可的一番训斥，对那些唯官是听的土财主们倒发生了一点效力。在一段时间里，他们残害群众的劣行有所收敛。